airiti Library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

The Road to New Historiography,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doi:10.6756/NH.200209.0021

新史學, 13(3), 2002

New History, 13(3), 2002

作者/Author： 杜正勝(Cheng-Sheng Tu)

頁數/Page： 21-4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2/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6/NH.200209.002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最完整的學術整合查詢平台—華藝線上圖書館 ●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 Find more academic articles on Airiti Library

新史學十三卷三期
二〇〇二年九月

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

杜正勝**

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的變革，有它的內在理路，也與外緣的政治社會情勢的變化密切相關。當前臺灣走向的歧異，在史學上顯露無遺。不過臺灣有些歷史學者努力在探尋史學的出路，似乎可以當作人類探尋自我和調適文化的一個樣本。

臺灣史學的第一代二次大戰後來自中國，傅斯年強調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沈剛伯認為史學研究不應與社會脫節。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引進社會科學方法，昌盛社會經濟史的研究，社會思想則代表當時的自由主義。

八〇年代中期以後，臺灣史學界出現一波新的風氣，逐漸形成以社會經濟為基礎的文化史。這是一群青壯輩的歷史家，在一九九〇年創辦「新史學」，正值共產世界解體，臺灣解嚴未久之時。他們提出對新時代的看法，也為自己的專業尋找新定位。除繼承新材料、新工具的傳統，還要嘗試新領域、新課題。這是內在理路。

然而九〇年代的臺灣不但完成民主化，也在尋求自我的認定，這對史學的衝擊遠比過去任何史學思潮或方法更深刻，五十年來臺灣以中國史為中心的史學教育與研究不得不檢討。臺灣史學何處去？臺灣史家當如何安身立命，變得相當分歧，甚至成為敏感的政治問題。也許下一波的新史學運動將不再是史家技藝的探索，而是史家心態的解放——如何突破長久以來以中國史為主體的習慣與束縛，重新建構世界性的歷史視野，為長年永續的實証研究開闢一條新路。

關鍵詞：新史學　傅斯年　沈剛伯　史學方法　後現代

---

*本文原為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四日劍橋大學東方研究系「川流講座」(Chuan Lyu Lectures 2002)演講內容。

**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一、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史學期刊《新史學》

一九九〇年春天，一批中央研究院青壯輩的歷史學家，結合當時臺灣有活力的同行，創刊一份新的歷史學術刊物，稱作《新史學》。十餘年來《新史學》甚獲好評，一般認爲最具有資格代表臺灣史學界的刊物，它要扮演的角色，有點接近《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在英國，或《年鑑》(*Annales*)在法國。我沒有要拿剛剛進入第十三個年頭的《新史學》和已經出刊五十年的《過去與現在》，以及超過七十年的《年鑑》作比較的意思，不過舉各位所熟悉的歐洲史學期刊作比喻，也許可以使各位比較容易理解我今天要講的課題。

《新史學》期刊沒有國王，它是由我這個世代以及年輕一輩的學者所共同組成的史學社群。然而作爲這份期刊的創辦發起人，期刊名稱的裁定者和發刊詞的撰寫人，我應該有資格來向各位說明臺灣的史學改革——也就是「新史學運動」。臺灣是一個小小的國家，在現代世界學術圈裡，處於邊緣地帶，不會引起世人的注目。不過，過去五十年的發展，臺灣在各方面的改變和成就，形成所謂的「臺灣經驗」，對轉型社會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臺灣經驗，除了世人熟知的經濟奇蹟和寧靜政治革命外，還有文化轉型和調適的問題，後者還談不上作爲成功的典範，目前毋寧說正陷於混亂的狀態，但它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否認的。所謂「混亂」是表現在國家、民族或文化認同的矛盾、衝突，在各種學門中，史學與這個問題的關係最密切。如果能從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的變革分析臺灣當前認同的歧異，也許可以做爲人類探尋自我和調適文化的一個樣本。那麼臺灣作爲社會科學的實驗室，[1]在經濟、政治之外，還有文化的意義。

[1]這裡借用臺灣大學社會學系陳紹馨教授的概念，他在一九六六年發表〈中

《新史學》期刊是史學改革運動中與現實社會保持較遠距離的一環，但如果不把它放在臺灣史學脈絡中觀察，也無法真正了解。本人榮幸地應邀來這個世界學術重鎮—劍橋大學報告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除了介紹史學社群內學術的傳承與轉變，也想和各位一起考察臺灣歷史學者與時代社會的互動，回顧過去，並思索未來新史學的道路。

二、臺灣史學的起點—— 一九五〇年

臺灣的史學發展當從一九五〇年開始。在此之前，清帝國二百一十二年(1683-1894)的統治沒有培養學問家，[2]日本五十年(1895-1945)殖民後期建立的短暫學術傳統，當她戰敗退出臺灣時，也隨之斷絕。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有一些歷史學者隨之來台，其中的領袖人物可以算做近代中國新史學的第一代人物。過去五十年臺灣的史學是這批人及以後幾代學生的業績，所以臺灣的史學傳統，離不開二十世紀初期在中國發展的新史學。

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止前一年(1944)出生的臺灣人，在國民黨退守臺灣並且宣佈長期戒嚴的第二年(1950)進入小學。《新史學》的發起人和我一樣都不曾受過日本教育，都在國民黨戒嚴體制中長大。像我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才就讀大學的這個世代，大多受教於中國新史學的第二代學者，只有一些人有機緣接觸到第一代歷史家，我是少數幸運者之一。

逃避共產黨而來臺灣的第一代歷史學者，思想上多屬於自由主義，或多或少帶有民族主義，即使有一些社會主義普遍都堅決反對共

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一文，收入他的《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2]《臺灣省通志稿》，卷 6〈學藝志〉、卷 7〈人物志〉，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以及臺灣清朝編修的各種地方志可以證明我的論斷。

產主義。主要聚集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和臺灣大學歷史系。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同時也是臺灣大學校長；史語所的研究人員同時也在臺大歷史系任教。一九五〇年史語所是臺灣唯一從事史學研究的機構，臺大是臺灣唯一培養歷史學者的學校，因此討論臺灣史學的發展，不能不溯源於史語所。

三、史學以求真為本務——傅斯年與史語所

史語所，一九二八年成立於廣州，創辦人是上面提到的傅斯年(1896-1950)。傅先生是北京大學文科高材生，一九一九年爆發的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當年畢業，赴英國倫敦大學大學院學習他在中國早已嚮往的實驗心理學，受教於權威學者史畢爾曼(Spearmam)教授。傅先生早年是個「科學迷」，相信自然科學方法具有普遍意義，故多涉獵科學方法的通論著述。他在倫大三年多，轉赴德國柏林大學研讀近代物理學，不久轉而攻讀藏語、梵文等東方語文。[3]不論在中國或歐洲，傅斯年雖然都不是歷史系科班的學生，但當一九二六年返國時，他的史學思想已經成形，準備在中國進行一場深刻的史學革命，[4]第二年傅斯年出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同年蔣介石的政府在南京成立，當過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創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是蔡先生北大時期的學生，乃建議蔡先生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以研究自然科學爲目標，史語所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個

[3]參王汎森、杜正勝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頁 37-53。

[4]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中國文化》12(1995/12)；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收入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C.E.P.S.

人文學研究所，甚至也可以說是一九五〇年以前唯一的人文研究機構；[5]把人文學者放在自然科學家之中的特殊結合，與傅斯年的歷史學有密切的關係。他向蔡元培院長解釋：史語所研究歷史只要使用新工具，增加新觀念，就可與天文、地質、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同列；他並且保證，研究的態度和方法如果不能符合自然科學的要求，史語所就沒有設立的必要。傅斯年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看待歷史學，這是他從大學到歐洲留學時一貫的態度，借用他的話說，歷史雖是舊領域，但史語所採用的新工具和新觀念則可爲它注入新的生命。[6]雖然早在一九〇二年清帝國改革派梁啓超發表過〈新史學〉一文，提出一些新觀念，但論近代中國新史學運動，還是以一九二八年傅斯年創辦的史語所目標和方法最爲鮮明，可以當作發軔的代表而無愧。

傅斯年新史學的特色是確定第一手史料的權威性，譬如檔案、碑刻、日記、書信等。歷史研究仰賴這種史料在近代歐洲，尤其是十九世紀以來，雖然已變成常識，但在文獻著述傳統極深的中國，不能不說是一種新觀念。何況他建立的史語所研究團隊最關心的方法，是利用考古發掘、語言和民族調查所獲得的新資料研究歷史，這種努力擴充研究資料的制度即使放在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學術潮流，也一點都不遜色。傅斯年的名言：

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7]

可以作爲史語所新史學最生動的寫照，和最扼要的宣言。

傅斯年的史學方法在擴充新材料之外，還有一點是擴充新工具，他所謂的新工具即是新學科。當時他認爲對歷史研究有幫助的學科，

[5]一九二九年中央研究院設立社會科學研究所，一九三四年取消，其民族學研究併入史語所。

[6]「史語所檔案」，元字 198 號之 1。

[7]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928)。

C.E.P.S.

如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和天文等，史語所則發展考古學、語言學和民族學。一般來說，考古學、民族學與史學的結合比較成功，語言學和歷史自從建所以來就不曾充分整合。後來由於種種因素，一九五〇年代民族的部分獨立成爲民族學研究所，而語言學部分也在長期的蘊釀後，終於在二十世紀快結束時分離了，那時我是史語所所長，距離創所將近七十年。

我比較詳細地介紹傅斯年在一九二八年所提出的新史學的思想，重視史料這點不但爲一九五〇年以後在臺灣的史語所所繼承，也因爲史語所屬於臺灣史學界的領袖地位，影響相當深遠。史學基本工作在於考訂史料的真僞，這種尊重資料的求真態度遂成爲臺灣史學的共通成分。即使後來有人不滿意傅斯年或史語所把史料研究的重要性抬得那麼高，對傅斯年「史學即史料學」的口號也有所曲解，但他們絕不挑戰「史學追求真相」這個嚴肅的任務，因爲歷史研究如果懷疑或放棄求真，那麼學術距離政治就不遠了。這是一九五〇年以後之臺灣史學與中國史學最大的差異之一。

然而傅斯年所重視的傳統文獻以外的新史學，田野的新史料，這點在臺灣並沒有深入到歷史學界。只有史語所努力地奉行這個原則，一九六〇年代該所進行一項大規模的集體研究，在所長李濟的領導下，撰寫「中國上古史」，就是利用考古發掘資料而建構古史的新史學。[8]

四、史學反映時代精神——沈剛伯

在國民黨戒嚴統治下的臺灣，歷史學者雖然沒有充分說話的自

[8]參〈中國上古史編輯計劃的起源及其進行的過程〉，《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第 1 本，P.i（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1972）。

C.E.P.S.

由，但可以有不說話的自由，不像中國連後面這點小小的權利也被剝奪了。一九五〇年以後的臺灣歷史學者，只要不去碰觸政治禁忌，基本上是可以享受有限度的學院自由的。以研究史料爲主的史語所遂能被戒嚴的大環境所容忍，而過著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從事脫離人群、社會與時代的歷史研究。諷刺的是，與世隔絕絕非傅斯年的作風。他個人參與很多國家大政的討論，也發表強悍有力的政治評論，毋寧是太關注時代與社會了。然而，他的史學思想卻塑造一個與他自己的風格完全不同的研究團隊。

來到臺灣，傅斯年的任務是出掌臺灣大學，可惜不到兩年，便因病去世(1950)，對臺灣大學的歷史研究產生影響的是他的朋友兼同事，文學院院長沈剛伯(1896-1977)。

臺灣大學原來是日本殖民時期的臺北帝國大學，一九二八年建立，與史語所同年。它的文政學部設有史學科，仿照日本國立大學體制，分國史（日本史）、東洋史（中國史）、南洋史及西洋史諸學門，設講座，由著名學者主持，如文政學部首任部長藤田豐八即是東洋史講座教授。[9]然而由於學生人數有限，臺灣人尤其少，只有兩名，所以日本的史學在臺灣並沒有生根。當日本戰敗撤離後，臺北帝國大學的史學可謂完全斷絕，到一九四九年乃由從中國來的歷史學者填補這個空缺。

沈剛伯稍早就到臺灣，一九四八年應邀來臺灣大學短期講學，適逢國共內戰轉劇，遂留在臺灣，並且推薦傅斯年出任臺大校長。沈傅兩人的交誼可以追溯到留學歐洲時期。一九二四年沈先生入學倫敦大學大學院，研讀埃及學及英國憲政史，一九二七年回國，亦任教於傅斯年所執教的廣州的中山大學；不久傅去創辦史語所，沈亦轉任南京

[9]參陳偉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簡介〉，網址：http://www.lib.ntu.edu.tw/spe/taiwan/academic/nol-ch2.htm；林秀美，〈臺北帝大文政學部簡介〉，網址：http://info.ntu.edu.tw/alumni/index6/photo.htm。藤田豐八事略，參看〈羅振玉書藤田博士墓表〉，《劍峰遺草》（東京：三秀舍，1930）。

的中央大學，直到來臺爲止。沈先生擔任臺大文學院院長長達二十餘年，到一九七二年才退休。當時臺灣的大學少，臺大又是臺灣最著名的大學，所以一九七〇年臺灣培養出來的人文學者，多少皆受到沈先生的影響。

關於沈剛伯的史學思想，針對史語所建立的歷史研究規範，首先他認爲史料並不一定可靠，即使日記和書信等第一手資料也不例外，而且無法求備求全；要以這麼具有先天缺陷的資料建立精確如自然科學的歷史學，是不可能的。其次，他同意歷史家的任務在求真，但他更體認從史料到歷史「真相」過程的複雜性，其中難免受到歷史家有意或無意的影響。沈剛伯說，同樣的歷史事件和史料，因爲歷史家選擇的不同，解釋和認識都會不同。換言之，他認識到歷史家對研究的進行和結果具有主導的作用。[10]從傅斯年，我們看到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 1834-1902)的影子，從沈剛伯我們聽到喬治・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 1890-1979)的聲音。傅斯年、沈剛伯是同時代的人，其差異有個人因素，也有時代因素。

一九六八年史語所四十周年所慶，沈剛伯應邀發表專題演講「史學與世變」。這是他的老友傅斯年創辦的中國第一所史學專業研究機構，老友謝世已經十八年，主持人史語所所長李濟，中國考古學之父，也是沈先生在臺大的同事，考古人類學系系主任。這場演講沈先生很委婉地指出史語所的新史學與時代社會脫節。他堅定地強調史學不只是書本作業，史家也不是象牙塔內的冥想者，史學必須跟著環境轉變而不斷變化，時代社會的轉變愈快愈大，史學也隨之愈新，所以歷史家要清楚地體認時代社會的脈動、掌握「時代精神」(Zeitgeist)。[11]

---

[10]杜正勝，〈史語所的益友沈剛伯〉，收入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11]沈剛伯，〈史學與世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0 上(1968)。

C.E.P.S.

沈剛伯並未否定史語所追求客觀歷史的新史學，只是他對史料所可能發揮的功能不如傅斯年那麼樂觀，而對歷史家在歷史研究過程中擔負的角色則賦予更大的關注。他比傅斯年更遠於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而近於柯靈烏(R. G. Collingwood, 1889-1943)，認爲歷史家研究的過去是仍然活到現在的過去。新史學不應該與社會脫節，但像他這麼深信英美自由主義思想的歷史家，在專制獨裁的戒嚴統治下，如何反映時代，能反映時代嗎？我是一九七〇年代初他最後一個指教的學生，這個問題直到今天我仍然迷惘。

臺灣的史學家在他的影響下（如果有影響的話），戒嚴時期曾經發出幾聲追尋自由的吶喊，但最近十餘年臺灣民主化的進程中，歷史家體認到時代社會的脈動了嗎？我也不能無疑。歷史家如何在他的著作反映他對時代社會的認識和判斷，的確是一大考驗。沈剛伯一生篤信自由，體察時代精神，但他執教的臺大歷史系在臺灣民主化後卻轉而保守，與臺灣社會脫節，和傅斯年之於史語所相對照，不能不說是另一種諷刺的現象。

五、社會科學方法進入史學——許倬雲和《食貨》

史家與時代社會互動而激發新的研究，的確不易，新史學的「新」，恐怕得回歸到史學技藝的傳統才比較容易看到具體的成果。一九四九年以後臺灣雖然進入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然而和中國不同，臺灣沒有與外界隔絕；歷年一批批學生出國留學，返國者多會帶回來新的學術思潮，只要不犯政治忌諱，是容許存在的。這是臺灣學術界的普遍現象，史學也不例外。第一波是自美國引進社會科學方法，時間在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最具影響力的學者是許倬雲(1931-)，學術期刊是《食貨》。

許倬雲一九六二年在芝加哥大學完成學位後返國，同時在史語所

C.E.P.S.

和臺大歷史系任職，後來並且擔任系主任，我在他主任任期內念完大學。上面講過，史語所和臺大歷史系是臺灣史學最主要的兩個重鎮，許先生乃更容易發揮他的影響力。他的專攻雖然是中國上古史，不過他提過以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歷史，各種專史和斷代的學生多肯定這種新的研究方式。他留在臺灣的時間雖然不滿十年，但經過他的努力，社會史在臺灣的史學領域中從默默無聞而變成主要的角色。

許倬雲與一批朋友，其中不少是留學美國的社會科學家，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創辦一種社會科學雜誌《思與言》。他們不滿意史學只作史料考證的工作，鼓吹運用社會科學輔助史學以歷史解釋。[12]其假設的論敵大抵是在歷史研究最有影響力的史語所，當時史語所的史學在史料的大招牌下變得更機械化和瑣細化，被批評爲專做小問題的考証。

《思與言》創辦之初還抱著學術參與的學者，在那個時代可以稱作自由主義者，他們溫和地要求自由和民主，代表所謂知識分子的良心，許倬雲是當中最活躍的一位。他備受各種壓力，最後不得不在一九七〇年離開臺灣到美國任教，直到一九九八年退休。不過最後二十年，許倬雲與臺灣史學界保持密切的連繫，對臺灣史學的發展仍有一定的影響。

在許倬雲離臺赴美的第二年，一種比《思與言》更學術的歷史刊物《食貨》再度在臺灣問世。《食貨》是老牌的社會經濟史期刊，一九三四年陶希聖創辦。陶先生是一九二七年爆發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主角之一，後來他有感於論戰流於政治理念的宣傳，於是退出論戰，鳩集一批學生，收集中國歷史文獻的史料研究社會經濟史。這個團隊的研究成果就發表在《食貨》上，對三〇年代的中國史學頗有刺激作用，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爲著名的歷史學者。

[12]參《思與言》社論，〈史學可走的路〉2.4(1964/11)和〈有感於當代史學〉3.3 (1965/09)。

C.E.P.S.

陶希聖(1899-1988)畢業於北京大學，也可以算是中國新史學第一代的學者，但不像其他第一代有留學的經驗。他專攻法律，從「禮」和「律」解剖中國社會的特質與發展，其歷史研究可以稱作爲「禮與律的社會史學」。[13]一九三七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前夕，《食貨》停刊，陶希聖投入政治，經歷很大的政治風險，這裡不能詳述。一九四九年他隨蔣介石到臺灣，仍然是蔣的核心幕僚，大約在一九六〇年以後才逐漸淡出政壇。

採用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以研究歷史，是陶希聖自一九三〇年代以來一貫的主張，[14]但一九七一年在臺灣復刊的新《食貨》，其社會科學是美國的品牌，與老《食貨》帶有馬克思主義色彩者不可同日而語。真正在推動這個風潮的是他的兒子陶晉生，也是留學美國返回臺灣大學任教的歷史學家，所以和一九六〇年代臺灣已經啓動的以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歷史的風氣正好前後相承接。

新《食貨》延續長達十七年之久，我這輩學者首先是讀者，後來變成作者，有些人則成爲編者，我即是其中之一。《食貨》引用的社會科學方法，主要是計量分析和心理分析，在美國都曾經風行一時，也有少數成功的著作，然而中國史料（尤其是近現代以前）卻很難應用。中國傳統缺乏數據觀念，即使有，也不精密；至於記錄個人心內的資料更少，過去幾十年只有明清族譜的分析研究稍有成績。[15]不過社會或經濟史的歷史研究在這次的新史學運動中逐漸與政治、軍事、學術和思想等傳統史學的重要領域並駕齊驅，雖然總體數量不是最多的，但此後比較有成就的歷史學者多是社會經濟史家，或與社會經濟史有

[13]杜正勝，〈陶希聖先生的社會史研究〉，《國史館館刊》5(1988)。

[14]陶希聖，〈食貨復刊辭〉，《食貨》1.1(1971)。

[15]劉翠溶院士的成果最顯著，她係在這次的史學改造中成長的學者，至於王業鍵院士研究清代糧價，也有很好的成績，他作品雖然也在臺灣發表，但一九六〇年以前就赴美，長期留在美國，故不列入。

C.E.P.S.

關係，尤其以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成熟的學者最爲顯著。

六、物質、社會與文化有機連繫的「新史學」

這波新史學運動之採用社會科學，除了方法上的困難，其流弊往往是按照理論的方向尋找史料，或以收集的史料來印證理論。換言之，社會科學提供史學理論或觀念，史學則提供給社會科學作爲比較研究的素材。[16]這樣的合作，地位既不平等，方法也很粗糙。史學淪落爲社會科學的奴僕，難怪產生不了傑出的作品。

《食貨》出刊既然長達十七年，作者群包含不同世代，廣義的社會經濟史是他們的共同點，每人的研究方法多少有一些差異，自然會造成新風氣；上面說過五十年來臺灣學界不斷輸入西方的學術思潮，也發揮一些作用。大概一九八〇年代將近中期時，法國的「年鑑學派」的論著便開始在臺灣出現，《食貨》和《思與言》都曾經刊出介紹或翻譯的論文。新的改變籠統地說，新史學的學者在研究經濟和社會之外，還要研究文化。歷史學的文化，義涵駁雜廣泛，傳統史學似乎也做了一些可以稱作文化史的研究，所以文化史是什麼，尤其與社會經濟結合在一起的文化史，便是我這一輩新史家要努力的課題。

我在一九六六年，即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那年進入大學，承襲第一、二代新史家自由主義的傾向，追求政治民主與個人自由；但從小在南臺灣的鄉村長大，對基層人民的疾苦有比城市的學者較深的感受，所以又帶有一點社會主義的傾向。當我決定以史學做爲終生志業時，誠如上面說的，是在以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研究歷史的潮流中。因爲我興趣的時代是距今兩千年的古代，當時所介紹在美國流行的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更難用得上，我自己也沒有太大的興趣，從另

[16]許倬雲，〈社會學與史學〉，收入氏著，《求古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頁 625。

C.E.P.S.

一觀點看，我似乎又是在潮流之外。

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我完成的碩士學位論文倒與一九六〇年代的中國史學頗有關連，而與臺灣的史學潮流相去較遠。我和中國學者一樣關注生產關係和社會性質等課題，但他們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概念分析中國古史的做法，我並沒有接受。政治不是唯一或重要的因素，主要是他們的論述不符合史料。中國奉爲教條的歷史發展階段論我也不採信，我採行的研究方法是從我認爲可信的史料和合理的解釋出發，試圖建構比較大的理論。這種信守無徵不信的原則，多少可以看到傅斯年的影響。

從一九七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我的研究領域屬於社會政治史，企圖在中國唯物史家與日本東洋史家對中國古代史發展的大解釋之外，提出另外的說法。我的觀點主要見於《周代城邦》和《編戶齊民》這兩本書，這裡不能細述；我只想指出一點，我的研究雖然提出與中國或日本學者不同的歷史解釋，但追根究柢和我所批評的對象無大差別，仍然偏於制度性的範圍，對歷史的理解不一定比他們深刻。此一發現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一直困擾我，我也試圖尋求史學思想的突破。法國年鑑學派我不了解，即使七〇年代中期我曾到倫敦政經學院(LSE)學習英國經濟史，似乎也不能幫助我突破困境。經過反覆的思索，一九八六年我終於稍稍理出一些頭緒，「人」來比喻歷史，發現自己過去研究的經濟、社會或政治，其實只屬於軀體的骨骼部分，至於血肉或精神還沒有觸及。我想這應該是新一波的史學改革應該努力的方向。我後來才知道早在一九七四年法國年鑑學派的勒高夫(J. Le Goff)已經提出幾乎完全相似的比喻了：骨骼和血肉，他是以心態(les mentalities)作爲新補充，謂之「模糊史學」(une historie ambigue)。一九九〇年以前我的史學思想還是相當模糊的，只用籠統的「文化」這概念做爲新史學的目標。

臺灣這群青壯歷史家之所以創辦《新史學》也有一個客觀因素，

C.E.P.S.

一九八七年陶希聖過世，他的《食貨》不久隨之停刊。一群《食貨》的讀者、作者或編輯志工覺得有必要再辦一個學術刊物，以表達他們對史學的看法與期待，《新史學》這份期刊於是就誕生了，我被推選撰寫「發刊詞」。按照過去的習慣，發刊詞往往是期刊的宣言，目標和規範盡在其中。然而《新史學》的發起人多是年紀接近的同輩，沒有師生關係，我也不是領袖，發刊詞只能模糊地寫，提倡一種開放、嘗試和求新的研究態度，至於要「新」什麼，則沒有明確的宣示。不過我還是表示了對沈溺於史料和過度重視社會經濟的不滿，也批判史觀學派背離史學的本質，主張在新材料、新工具之外，還要嘗試新領域，尋找新課題。[17]

什麼是新領域或新課題？一九九二年我在一次「什麼是新社會史」的演講中，把歷史研究的領域分爲物質的、社會的和精神的三大範疇，主張研究課題要盡量能包含二或三個範疇，而且成爲有機的連繫。[18]換句話說，即使是物質性的課題，要能講到它的精神層次，反之亦然。我認爲史學的對象不能脫離人群，所以應以社會爲主軸，但稱作「新社會史」，當然是想與臺灣前一期的社會經濟史學有所區隔。我的實證研究以「人」與「生命」爲課題，不像過去的哲學史家或思想史家談抽象的「人性」，而是從具象的身體入手，分析「氣」的觀念以至於精神、魂魄。這種研究牽涉到醫學史，但重點是探索醫療、社會與文化的關係，所以又和傳統的醫學史不同，當然也涉及過去思想史的一些問題。[19]一九九〇年代有不少年輕學者投入這個領域，不

[17]參《新史學》 1.1(1990/03)。

[18]杜正勝，（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 3.4(1992/12)。

[19]關於我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舉幾篇論文參考。如〈形體、精氣與魂魄——中國傳統對「人」的現象〉、〈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分別刊於《新史學》 2.3(1991/09)；6.1(1995/03)；8.4(1997/12)。另外一篇長篇論文〈從眉壽到長生——中國古代生命觀念的轉變〉，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論是經脈、疾病、本草或方藥，都從文化的角度出發，匯歸於所謂的中國文化的解釋。[20]一般認爲這是過去十年臺灣史學最具代表的貢獻。

上世紀最後十年興起的新史學，不只限於醫療而已，屬於過去的宗教史、性別史或生活史的研究多有新的視野，可以說是心態史和(或)文化史的範疇。本來這個領域就比較模糊，各別的認定必有一些差異，[21]說服性當然也有別，總之都希望能揭露歷史文化深層的特質。

七、九〇年代新局勢突顯過去歷史教學和研究的限度

上面第四節指出沈剛伯的史學思想是歷史家要體認時代社會的脈動。當然，同一時代社會各別歷史家的認識與反應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也會有一些相同的現象。戒嚴時期的共同趨勢，歷史家往往反省和批判中國長期的專制，藉此表達他們對民主的嚮往與自由的追求。不過，臺灣史學信守史料之客觀性的基本原未變，歷史家不會因爲現實的關懷而妨害他論著的學術性。我的兩種代表作《周代城邦》

66.2(1995)。

[20]研究成果不少，茲舉幾位年輕學者的代表性論著以見一斑。如李建民，《死生之域——周秦漢脈學之源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李貞德，〈漢唐之間求子醫方試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68.2(1997)；林富士，〈頭髮、疾病與醫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71.1(2000)；祝平一，〈靈魂、身體與天主——明末清初西學中的人體生理知識〉，《新史學》7.2(1996/06)；陳元朋，〈唐宋食療概念與行為之傳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4(1998)；張嘉鳳，〈生化之源與立命之門〉，《新史學》9.3(1998/09)。

[21]這裡只舉我在一九九〇年中期撰寫，最近才發表的〈古代物怪研究〉和李孝悌和蒲慕州的著作以供參考。李孝悌，《晚清社會下層的啟蒙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臺北：允晨出版公司，1995）；其英譯本是 *In Search of Personal Welfare：A view of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和《編戶齊民》既是研究古代歷史的實情，也透露我對中央集權的厭惡與對苦難人民的關懷。別的歷史家也會有他們的心路歷程，這方面的資料公佈的還不多，無法詳論。

進入一九九〇年代，當世界肯定臺灣民主化之時，臺灣的歷史家卻不一定能體會時代社會的動脈。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治、社會，甚至是文化的變革，臺灣學術界，即使是以前團結一致反對專制的自由主義者，卻不幸地分裂了。有的選擇民主而寧願創建新的國家，有的卻懷念中國這個文化臍帶，期待專制中國有所改變。這是十年來爭論不休的國家文化認同的分歧，歷史家受到的衝擊更大，這是臺灣五十年來以中國史爲主體的歷史教育和歷史研究必然的結果。

二十一世紀開始，臺灣的史學研究與教學的規劃，大家已逐漸肯定應該要包含臺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以前稱作西洋史）才算周全。這種認識可是經歷相當曲折的過程才完成的，尤其臺灣史與中國史的糾葛，直到今日都還可能引發政治風暴。先說中國史與西洋史。

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國民黨只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政黨，在其統治下的教育思想也以民族主義爲主軸。國民黨統治臺灣後，爲徹底清除日本殖民教育的遺留，特別加強灌輸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教育便擔負此一政治任務，以塑造人民的意識型態。但承襲二十世紀中國教育的歷史課程，西洋史也有一定的重要性；這可能是因爲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不斷吃西方帝國主義的虧，爲知己知彼而設計的。這種制度國民黨也帶到臺灣來，從中學到大學的歷史教育皆兼具中國與西洋，而以中國史是主，西洋史是輔。

教育和研究互爲因果，以中國史爲主要內容的教學不太可能培養西洋史（或世界史）的歷史家。本來臺北帝國大學歷史科設有國史（日本史）、東洋史（中國史）、南洋史和西洋史四個講座，具有比較寬廣的世界觀，可惜隨著日本撤離而終止。五十年來臺灣的史學研究只有中國史而已，即使是大學的西洋史也只停留在教學的水平，談不上研

C.E.P.S.

究。[22]學術研究既然狹窄，教育出來的國民自然充滿著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

臺灣史的研究情況比西洋史還不如。本來一個地方研究當地的歷史，一個國家研究本國的歷史是最自然不夠的；可是有效統治只及於臺灣的國民黨政府，不但不把臺灣史當作本國史，甚至也不願它成爲地方史而加以發展。像我在國民黨退守臺灣第二年就讀小學的人，直到大學，沒有上過一門臺灣史的課，片斷的臺灣史知識是從中國史零星獲得的。國民黨作爲一個外來政權，設定的制度和管制措施，不使臺灣人有機會了解臺灣的歷史，更不容許有以臺灣作主體的臺灣史，只允許按照國民黨解釋的臺灣史存在。臺灣史只是中國史的一部分零碎知識，是中國人、中國文化到遙遠的移殖。臺灣的史學看不到臺灣史。此一荒謬現象在一九八七年戒嚴解除後才全面改觀，進入一九九〇年代，臺灣史突然變成年輕人最有興趣的領域，有人甚至稱爲「顯學」。[23]

一九九〇年代是臺灣正式步入民主化的時代。一九九六年臺灣舉行有史以來第一次人民直接選舉總統；二〇〇〇年，執政五十多年的國民黨下台，臺灣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這些現象正透露十年來臺灣社會產生本質的變化，臺灣主體意識覺醒了，臺灣人尋求做自己的主人，不再是中國的附屬品。這是空前的世變，在政治的表現非常明確，

[22]參杜正勝，〈臺灣中國史研究的未來〉；楊肅獻，〈臺灣的西洋史研究，一九五〇— 一九九五〉，皆發表於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歷史學學門現況與發展研討會」(1995)。

[23]彭明輝研究一九五〇年以後的臺灣史學，他統計臺灣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和博士論文，一九六〇年以前無臺灣史，全部都是中國史；一九六一至一九七〇年，中國史占 93.6%，臺灣史 3.2%；以後臺灣史占的比例，一九七一至一九八〇年，6.9%，一九八一至一九九〇年，10.9%，一九九一至二〇〇〇年，23.2%。參看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頁 161-162。

但文化則模糊而糾葛。有人強調臺灣文化的獨特性，與中國文化不同；相對的也有一些人因而不安，深怕「中國」在臺灣消失。於是政治上所謂的統獨之爭在史學上便演爲中國史和臺灣史的衝突。

局外人應該不會認爲臺灣史和中國史必然非衝突不可，不過處在臺灣情境內的人卻各有堅持己見的理由。譬如中學教科書就曾發生過這樣的糾紛，「本國」及「本國史」到底指臺灣或中國，答案往往因政治立場而截然不同。我爲超越這些爭議，在九〇年代中期我提出同心圓的架構來規畫歷史教育，即從臺灣史出發，擴及中國史、亞洲史以至世界史。我也希望這個架構在史學界能夠開展，歷史學者不再限於中國史的範圍，建立臺灣的解釋觀點，而發展爲世界性的格局。但我的理論在歷史教育方面因爲涉及政治不同立場，還無法落實；在史學研究上，也因爲過去缺乏基礎，現在還無法實現。

八、臺灣觀點的歷史解釋

我的朋友和我創辦《新史學》正逢共產世界解體，也是臺灣解嚴不久，開始民主化的時代。這批新史家學術性遠高於現實性，我們依然就自己專業之所長，在中國史研究領域內追求新的突破。

當時我們相信新的世界秩序必將出現，新的思潮也正在蘊育中。我們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是樂觀的，並不懷疑歷史的真實，而是要採用各種有效的方法，謹慎地追求真實的歷史。這種態度頗受到一九九〇年代在臺灣逐漸流行的後現代史學的挑戰。後現代史學也是舶來品，但與一九六〇年代的社會科學以及一九八〇年代的年鑑學派不同；它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對待史料，根本懷疑有所謂的歷史真實。我認爲新史家應視後現代史家爲諍友，他們苛刻的挖掘是要更徹底地檢查史料潛在的偏見。新史家固然必須了解史家、史料與讀者之間的複雜性，但也應有追求歷史的真或近真的信心。歷史家如果放棄追求真實，

C.E.P.S.

那麼歷史與政治便無差別，這樣史家便有淪落爲政客之工具的可能。

四百年前南島民族的臺灣還處在原始社會的狀態，一六二四年荷蘭人進佔臺灣，把臺灣拉入新形成的世界體系。一六六一年和一六八三年，中國兩種不同政權先後統治臺灣，後一波把臺灣納入中華帝國體系，直到一八九五年日本殖民臺灣爲止，五十年後接著而來的是國民黨政府。臺灣人尋求「自我」不過是最近十年的事而已。由於臺灣最早的根源不是強勢文化，缺乏輝煌的傳統，她的「自我」是結合許多不同外來成分的複合體，但因爲過去幾十年的特別情況，臺灣被放棄自我，宣稱代表全中國，而且自信這裡才是真正的中國。

到一九九〇年代，此一歷史幻象徹底破滅覺醒了，新的歷史認識逐漸從中國中心轉爲臺灣主體，長期被邊緣化的臺灣史研究，已引起年輕學生更大的興趣。我提倡的同心圓史觀扭轉「中國主體、臺灣附屬」的認識方式，也有人深有同感。從某種角度來看，不贊成後現代史學的我，何嘗不也是一種反抗文化霸權的「後現代」？

解構了以中國史爲主體的臺灣史學，下一步該怎麼走呢？在多數歷史家的專長還是中國史的限制下，也許臺灣下一波的新史學運動將不再只是材料、工具（學科）、方法或理論等史家技藝的探索，也不是後現代主義的歷史解構，而是歷史家心態的解放—如何超越中國史的界限，突破長久以來臺灣史學社群以中國史爲主體的習慣與束縛，從臺灣的經驗重新理解中國歷史，或以亞洲和世界的寬廣視野看中國史。

臺灣脫離中國政權統治，從日本殖民(1895)算起超過一百年，從國民黨退守臺灣(1949)算起，超過五十年。歷史解釋難免有形或無形地受到政治的操弄，臺灣與中國的距離將使臺灣史學的歷史解釋不受政治思潮或壓力的影響，應該可以更接近真實。當然，世界上中國以外的國家都可以擁有這樣的有利條件，不過臺灣曾經有過中國的政治經驗，而且直到現在仍浸涸在濃厚的中國文化氛氤中，這卻是其他國家的史學者不可能獲得的經驗。基於此，臺灣觀點的歷史解釋有先天的

C.E.P.S.

優越性，這是臺灣史學發展的契機。

臺灣史學不能，也不會再像過去五十年限於中國史的研究。過去十年來，臺灣年輕一代的學者一方面更多人關注臺灣史，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在歐美接受西洋史的專業訓練，比我這代人更有能力超越中國史的限界。我相信歷史研究的技藝可以而且也應該不斷求新，但研究格局的擴大與研究觀點的反省，將決定下一波新史學運動的成敗與貢獻。

C.E.P.S.

The Road to New Historiography,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Cheng-sheng Tu

Member, Academia Sinica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has been prompted by a series of impetus from within the discipline, it has inevitably been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s from without. At present, Taiwan is shrouded in a mist of national, ethnic and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and struggle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appears more pertinent to the nature of these differences than any other academic pursuit. Indeed, many historians are searching for new directions in their studies, and the quest may very well be regarded as a model illustrative of mankind's self-exploration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 Taiwan has its beginning in the era follow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hen a number of historians arrived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Among them, Fu Ssu-nien was in the belief that the spirit and method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could be applied to historical studies, while Shen Kang-po maintained that the study of history must keep pace with the Zeitgeist of the society. Emerged in the 1960s and the 1970s was a trend towards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ies to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Many of the historians of the time shared a common interest in socio-economics. Liberal at heart, they continued to demand freedom and

C.E.P.S.

democracy in a moderate, rational manner.

Following the mid-1980s the historical community in Taiwan witnessed yet another new wave, and the study of cultural history based on investigations in socio-economics began to take shape. In 1990, a time when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t power was still in progress and Taiwan's martial law had just been lifted, a group of Taiwanese historians launched the *Journal of New History*. Possessive of an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s the new era and new expectation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professionalism, the founders of the Journal had exerted the best of their efforts to uphold the tradition of applying new methodologies and new materials and to look for major breakthroughs in the realm of historical studies. This was the intrinsic impetus in the discipline.

The 1990s was a decade when Taiwan entered the age of true democracy,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was on the rise at the same time. To be sure, the drastic change brought unprecedented impact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Taiwan, and the validity of history education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that had been China-centered for half a century had to be re-examined.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rigid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Taiwan's historians must move on to advance their scholarship. Yet, the question remains: what is the next step, anyway? While the debate on how historians should prepare themselves for the next step has become a politically sensitive issue, it appears that historians in the next wave of the New History Movement will not confine themselves to explorations in historical crafts. They are likely to pursue a more liberal mentality that will help them get rid of the bondage molded by the China-centered pattern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re-construct a global historical outlook, one that will usher in yet another horizon in continued, substantative historical research.

Keywords: New history, Fu Ssu-nien, Shen Kang-po, Historical methods, Post-modernism

C.E.P.S.